

蒙以养正：朱熹蒙学观念之厘正

张锦波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朱熹蒙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蒙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蒙学”构成朱熹蒙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引导着朱熹对蒙学问题的诸多思考。“教化”和“文化传统”是传统蒙学思想两个关键词，也是解读朱熹蒙学思想及其实践的重要视角。以“教化”而言，朱熹蒙学深涵社会性教化和个体自我教化之深刻内容；以“文化传统”而言，朱熹蒙学深切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深切关注儒家道德规范、日常规范如何现实地作用于人们日常生活，这也呈现出朱熹蒙学思想的实践性特征。

关键词：教化；文化传统；蒙学；朱熹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1.096

引言

从“蒙学思想”角度来看，朱熹蒙学思想是传统蒙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理论，也是朱熹对传统蒙学思想基本问题的理论性思维成果，由此，“蒙学思想”构成朱熹蒙学思想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教化”：朱熹蒙学思想的理论旨趣

在传统语境中，蒙学是社会性教化活动的重要形式，蒙学思想也是传统教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化不等同于教育，教化思想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意义上教育思想。现实层面的社会性教化活动固然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性知识的传授或社会性技术的传授，但是，这些只是社会性教化活动的具体形式，社会性教化活动本身的意义远不限于此，而是指向社会性教化意义上为全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奉的社会性规范的“现实造就”和个体自我教化意义上全社会所公认的合宜的行为规范的“现实成就”。在此意义上，传统语境下的“教化”则不仅仅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知识的传授或技艺的习得，而蕴涵着深刻的存在论意蕴。

李景林先生指出的，“任何教化的理念本身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要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把自身蕴涵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存在，从而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教化的作用，并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塑成和生命成就。”通过这些“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那些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奉的社会性规范得以“具体化”“现实化”，而具体落实于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且可以现实地来规范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自身蕴涵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存在，从而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教化的作用，并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塑成和生命成就”，社会性教化就此也不仅仅是某种外在于己的“陌生东西”，而是时时刻刻体现于自己所有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并且规范着自己所有社会实践活动“必须如

此”“势必如此”这般地开展的那些合宜的“仪式、仪轨、习俗等”，社会性教化于个体而言也不再只是某种知识或技术的习得，更为重要地是，是在这些社会性教化活动的具体践行中找寻到“存在的家”。

人们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来学习，这是方式或途径，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将这些仪式、仪轨、习俗等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存在，是为了“受到教化”，以为全社会所认可的合宜的行为规范来“规范”、引导自身行为“合宜”地开展，而个体也由此由个体性存在而向普遍性存在提升，实现自我教化，完成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绽现，且这种自我教化过程是始终存在、不断教化的。

但是，教化蕴涵深刻的存在论意蕴，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教化活动是某种思辨性的、脱离于一般日常生活的；教化本身要求不是造就某种纯粹“思的事业”，而是“现实地成就于”百姓日用于其中的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之中，通过全社会成员每时每地都会生活于其中的“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来加以现实证成的。

作为社会性教化重要形式，蒙学也应在此意义上理解。一方面，与通常如儒家“六经”等成人之学或大学教育来看，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得“过于浅白”。但是，蒙学这种“过于浅白”，无损于其作为社会性教化活动重要形式的价值和意义，它仍是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奉的社会性规范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现实地着落于全体社会成员各种实践活动之中，规范着、引导着全体社会成员合宜的行为规范的现实证成，而全体社会成员也在这些“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的实践活动中实现自我教化，且现实地证成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及其行为的合理性、有效性。而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蒙学的“浅白”“粗糙”，蒙学具有其他社会性教化形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即它可以为更多社

会成员现实而有效地掌握，从而更好地取得更为显著的社会教化之功效，教化所蕴含的存在论意蕴也才绽现出涵摄全体社会成员存在及其各种实践活动的普适性。

在朱熹蒙学思想中，“教化”无疑也是其思想及实践的理论旨趣。葛兆光先生曾说：“在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中，继程颐之后，朱熹可能是最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世俗化、生活化，进而形成实际制度的一个学者。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在意的，也许是因为他长期教学的缘故，他在探讨各种超越和深奥的道理时，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以及生活中人的思想与行为对原则的表现。”朱熹的蒙学思想及其实践，则不仅仅是一种“上学”之“下达”，而是蕴涵着深刻“教化”意蕴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理学家试图将儒学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世俗化”“生活化”，进而形成人们现实生活某种“秩序”的积极努力及其理性思考，其中，“社会性教化如何现实地可能”则构成了朱熹蒙学思想及其实践，以及宋儒“将儒家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是具体实践之指南。

二、“文化传统”：朱熹蒙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中国有着悠久的蒙学实践传统，但是，“蒙学实践”不等同于“蒙学思想”，“蒙学实践”研究也不能混同于“蒙学思想”研究。“蒙学实践”主要涉及“历史地”来考察传统蒙学实践活动，如研究蒙学制度形成与发展分期等，更多地隶属于历史学研究和实证科学研究等；“蒙学思想”则主要涉及“哲学地”考察传统蒙学实践活动，是对传统蒙学实践活动的“一般性”反思，反思传统蒙学实践活动为何会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等，它更多地是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等。

以“蒙学实践”角度来看，蒙学更多地呈现为简单易行的蒙学教材、蒙学教育活动等的“现实”开展，这并不是否定这种“蒙学实践”活动不具有我们以上说的作为社会性教化实践形式所蕴含的生存论意蕴，只是更侧重于对这种活动本身的分析；以“蒙学思想”角度来看，蒙学首先是“思想”或“一般思想”，是蕴涵在那些蒙学实践活动背后、且构成这些蒙学实践活动之合理性根据的“一般思想”，这作为“一般思想”的“蒙学思想”内涵于这些蒙学实践活动的，需要对这些蒙学实践“反思”才得以显现出来；同时也蕴涵在传统思想家们关于蒙学实践或蒙学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之中，这又借助于“蒙学思想”本身的基本主题、义理框架等才得以独立而完整地展现出来。

若以“思想”来看，与我们熟悉的充满思辨性的思

想家式思想不同，“蒙学思想”显得“过于平常”，但这并不意味着蒙学思想不是“思想”或不重要，与天才般思想家式思想一样，这也是对于世界、人生和自我等系统性的理性思考。只是较之于思想家式思想更多地展现出对“传统”或“常识”的“超越性”或“突破性”和思想家自身个性的充满彰显不同，蒙学思想更多地是对“传统”或“常识”的“继承”与“传统”，展现的乃是包括天才的思想家们和最普遍民众在内都可以“共同拥有”的“共同思想”或“普通思想”，甚至天才般思想家式思想也可能事先性地以这种“共同思想”或“普通思想”为其思想来源，甚至于思想家自身思想的那些“真知灼见”也需要再“回归”“还原”为这种“共同思想”或“普通思想”才能够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和长时段地传承，这种“共同思想”或“普通思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传统”。

葛兆光先生曾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来解释这一“文化传统”。葛兆光先生说：“我所说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人士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着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与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

乍看起来，蒙学在内容上极为“平常”，只是些日常礼仪规范、日常生活知识等，如朱熹说：“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是也”；在形式上，也极为“易简”，无非是些通俗文本的诵读记忆、行为规范的日常训练等，朱熹说：“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但是，作为社会性教化活动的重要实践形式，蒙学形式上的“易简”不是它的劣势，反而会让它能够更多社会成员以更为容易接受的形式而接受、掌握和使用，取得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社会教化效果。

作为“思想”，蒙学思想这类“文化传统”或“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也是对于“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也是一整套解释系统，也会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但“文化传统”不是某种“天才智慧的萌发”，更多地表现出作为某种“不言而喻的依据与假设”，是“一种

‘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而这种“文化传统”又不仅仅是某种“民间思想”或“民众思想”，或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是包括天才般思想家和最普遍民众都可以通过“最基本的教育”、只要是“有一定知识的人”都可以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它是“人们的文化底色”，而不是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特定思想的反映。

在此意义上，“文化传统”具有全社会性特征，它是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思想”或“普遍思想”，即使作为“天才智慧的萌发”的思想家式思想也会被深刻地铭印上这种“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甚至于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必须将自身“社会化”“大众化”成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接受、掌握和使用的“文化传统”，这些思想家式的思想才可以对现实世界和真实历史产生有效的影响。

通过以上对“蒙学”“蒙学思想”的分析，我们找寻到传统蒙学思想及其实践的两个关键词：“教化”和“文化传统”。“教化”赋予传统蒙学思想及其实践在其易简形式以极为重要的人文意蕴和哲学生存论意蕴，同时以“社会性教化如何现实地可能”或“蒙以养正如何现实地可能”蒙学思想及其实践这一基本主题来引导我们对传统蒙学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而“文化传统”又要求我们始终留意于蒙学思想的思想属性和思想内容，也要求我们关注蒙学思想及其实践中对“最基本的教育”的强调和“用意”，而这也正是传统蒙学思想及其实践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不乏高深而又思辨的思想，如探究理气关系的理本论、思辨心、性、情等的心性论等等，但是，朱熹思想仍然是以“教化”为其基本内涵的，关注的仍然是以儒家名教纲常、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社会性教化如何现实可能的问题，如黄宗羲曾评述朱熹与陆九渊学术的共性时说：“二先生（朱熹、陆九渊）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纲常”“名教”寄托着儒家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的理想，也表征着儒家学者心目中合宜的社会性规范和个人合宜的行为规范及其实践要求，而这也是作为儒家学者朱熹的基本学术立场和理论旨趣。

而“纲常”“名教”的维系，对于朱熹来说，也不是一个理论性的思辨话题，而是需要时刻着落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实践工夫”。工夫总在“平常”“近处”。如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如洒扫大厅大廊，亦只是如洒扫小室模样；扫得小处洁净，大处亦然。若有大处开拓不去，即是小处但不曾尽心。

学者贪高慕远，不肯从近处做去，如何理会得大头顶底！”“近处”“小处”不意味着道理就小了，或是社会性教化意蕴就弱了，“近处”与“远处”“小处”与“大处”是相对的，却都是公共之“理”的“分殊”之别。以“理”来看，“只此一理”。与讲精深道理的“大学”无本质差别，也都是社会性教化和个体自我教化的重要方面，较之“日常工夫”“小学”，“大学”只是把在“小学”阶段学到的东西“推”了出来而已。朱熹说：“如今为学甚难，缘小学无人习得。如今却是从头起。古人于小学小事中，便皆存个大学大事底道理在。大学，只是推将开阔去。向来小时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个坯素相似。”

因此，文化传统对于朱熹不仅不是某种粗浅的道理，或是只是适用某些特定人群（如儿童、未受教化的成人等）的简单道德规范或行为规范，而是“皆存个大学大事底道理在”的，是“似一个坯素相似”的，是成就理想人格、理想生活方式、理想行为规范的基质。

结语

以“蒙学思想”而论，我们不能因形式之“易简”、内容之“平常”而视朱熹蒙学思想为朱熹其他思想（如理本论、格物穷理工夫论等）的“附属思想”或“衍生品”，朱熹蒙学思想在形式上的“易简”、内容上的“平常”乃是它作为“蒙学思想”而呈现出的特有思想性质和理论旨趣所致。作为传统蒙学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理论成果，朱熹蒙学思想自有其作为“蒙学思想”特有的理论语境和义理框架，以“教化”和“文化传统”为其思想基本要素，主要考察蕴涵社会性教化和个体自我教化意蕴的“文化传统”如何在现实的社会性教化活动中得以成德成教，即“蒙以养正如何现实可能”，而这也是朱熹思想自身理论特质所造就的。

参考文献

- [1]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黄宗羲原著, 全祖望补修.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4]李景林. 教化视域中的儒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作者简介: 张锦波, 男,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史等。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联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项目“新安理学家蒙学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